

浅议余靖的外交思想

赖井洋

(韶关学院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5)

摘要:余靖从“和”的政治理念出发,阐述“和”而“两存其好”的外交思想,维护了国家主权尊严和国家利益,缓和了北宋与西夏、契丹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化解了北宋面临的危机,对维护北宋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余靖;外交;和;两存其好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11)11-0019-04

余靖(1000-1064),字道安,北宋名臣,谥“襄”,后人尊称“襄公”,广东曲江(今广东省韶关曲江)人。

“和”而“两存其好”是余靖针对北宋与西夏、契丹的特定外交关系而提出的外交策略与思想。余靖以“和”为主导,以“两存其好”为目标去处理北宋王朝与夏、辽的关系,为北宋正确处理边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余靖所主之“和”并非片面的、无条件的,而是以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国家利益不受损失为前提和基本原则的。本文就余靖“和”而“两存其好”的外交思想作一粗浅分析。

一、以“和”为要,两存其好

“和”是余靖政治理念的重要内容,“和”也是余靖处理北宋边事的重要原则,以“和”为要,就是要达到“两存其好”的目的。

(一)“和”是余靖政治理念中的基点

余靖进士及第,授赣县尉之后,他就写有《从政六箴》,其中《和箴》就表现出“和”的深刻内涵,这种内涵就是治政宽容的仁政思想。同时,他又说:“四序均和,聿届蕴隆之候;万邦在宥,爰推钦恤之仁。”^{[1]498}溯其之源,当为儒家“仁”之思想的体现。由这一基点演绎出余靖“安民为本”的政治思想核心,那就必然

会对其于处理边事产生出一定的影响,因此,余靖在处理北宋与西夏、与契丹的关系遵循“和”的原则,与其政治理念是相承的,可以说,余靖于北宋边事的处理是主“和”的。

主“和”是北宋朝廷处理边事的主流思想。北宋自太祖赵匡胤开国后,太宗曾率兵灭北汉,并乘胜征战,企图收复被契丹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历经数战,但高粱河、岐沟关两役战败后,北宋便放弃了收复幽云失地的打算,对契丹改取消极防御的政策。而契丹则伺机南下,进逼开封,北宋朝廷上下,一时恐“辽”气氛弥漫,这种政策和氛围直接影响到之后的宋真宗,“澶州之盟”便是真宗所为。而至仁宗朝时,开国初所形成的“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导致朝官多为文臣,仁宗朝从王曾至曾公亮,二十几任宰相,几乎全部为文臣出身,文臣于兵事,作用有限,惧战心理愈发严重,至元昊请和,“国家大臣至于边将,咸欲息肩以休士卒”^{[1]652},导致边防武备松弛,而仁宗本人,“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于色”^{[2]本纪第九},其政绩是“为人君,止于仁”^{[2]本纪第十二},但“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3]2}。所以范仲淹所上《十事》中,便有了“修武备”的重要内容,并在新政中得以实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西夏的请和、契丹的窥

视,朝廷上下争论多于定论。而余靖冷静思考,认真分析,形成了他谋求和平的外交思想。

(二)以“和”为要,处理北宋与西夏的关系

对于西夏的请和,余靖思想上经历了一个“拒和”到“速和”的过程。

庆历四年(1044)秋,“元昊在经三次大战,战败宋朝后,气焰甚嚣尘上”;然而就在此时,元昊迫于国内财力枯竭、契丹兵临其境之压力,决定归款宋廷,而宋廷欲行封册之礼,以为如此即可“息兵减费”,天下太平。余靖却以为,这种损害国家威信的和平,并不能达到和平的初衷,反而会给那些割据势力分裂国家以某种借口,他提醒仁宗,“或欲速成和好而屈名分,则天下其耻之”,且“元昊天生凶狡,非独今日知之”^{[1]724},在“思和与不和,皆有后患,则不必曲意从之,以贻国羞”^{[1]697}。这就是余靖主张拒“元昊之请和”的理由。而当契丹以兵临西境,托语曰为中国讨贼,不断于军事施压,“徇北虏而绝西戎”^{[1]718},“纳西戎而违北虏”^{[1]718},俱有兵祸之危险,朝议汹汹,莫衷一是时,余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认为:“唯有速行封册,使元昊得以专力东向,与契丹争锋,二虏兵连不解,此最中国之利”。于是“朝廷遂发夏册,臣元昊。西师既解严,北边亦无事”。北宋两面受敌之困局既破,岁币之贡纳亦得以降缓,赋税亦为之而松宽,利国利民。此乃余靖主“和”之根本。

(三)“敦示大义,两存其好”,处理北宋与辽的关系

余靖对宋、辽关系的处理,也是坚持“和”字为先的。其实,从余靖“三使契丹”之为,也可以看出余靖是以“和”之理念把握宋、辽关系的。一使契丹,余靖充当的是“和平之使”;二使契丹,余靖会辽主于九十九泉,申明国策,敦示国义,从而达到“两存其好”之目的;三使契丹,余靖履调停之责。余靖三使契丹,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任务,从此,宋辽交恶之局面得于扭转,和平局面得于形成。另一方面,就余靖三使契丹过程中,对契丹民俗、官仪的研习,所作之“胡语诗”而言,都可视为其友好之作的佐证。

我们要明确的是,余靖所主张的“和”,并非是曲膝而求“和”的,而是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因为损害国家利益、曲膝而求来的“和”,不仅不能持久,而且会隐藏灾难。基于这样的认识,余靖积极支持“庆

历新政”,目的也是为了使北宋王朝通过革新尽快地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

二、强调“主权在我”的国家主权思想

国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不仅是一个外交人员的职责,更是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余靖在对辽、西夏的观察与交往中,认识到它们都有对北宋王朝的国家主权的侵犯,因此,余靖明确地提出了“主权在我”的国家主权思想。

(一)谴责西贼侮玩朝廷,维护国家尊严

早在1038年元昊称帝后,就曾向宋朝要求“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2]夏国传},这种无理要求,当然地遭到北宋王朝的拒绝,北宋王朝进而剥夺了元昊的官爵,停止双方的互市,也就必然地导致了两国关系破裂。之后,元昊抛弃了唐、宋王朝赐封给其祖的李姓、赵姓,改姓嵬名,称“吾祖”。“吾祖”为党项语,意为“青天子”。而元昊在给北宋的上书中居然使用“吾祖”之称谓,这种称谓实是对宋朝的一种侮辱。所以,余靖分析说:“窃闻元昊所上书中有‘吾祖’之称,今遽令来人朝见。臣初虑朝廷之意,厌苦用兵,恐其乘秋侵扰边鄙,所以僭俯曲从,但云远方不足与争,得其称臣,则不惜呼为‘吾祖’。臣朝夕思之,此乃西贼侮玩朝廷之甚。古外域称单于、可汗之类,皆中外共知。若从其俗,固无嫌。今昊贼无端撰此名目,且彼称陛下为‘父’,却令陛下呼之为‘祖’,此非侮玩而何?贼又言,九州十三县是其‘故土’。况灵、盐、绥、宥,皆朝廷旧地,若辨封域,犹当归之国家。许蛮方者,不一而足。惟陛下留神,磨以岁月,则天下幸甚!”^{[1]666-667}又说:“元昊累世翻覆,性同禽兽。……,今者如定之来,乃形割地之词,又知贼意轻侮中国,甚于前时”^{[1]666}。余靖在这里,非常明确的指出,涉及到国家尊严、领土和主权问题,必须坚决捍卫。

(二)明确元昊请和,“主权在我”的观点

关于元昊请和的问题,契丹遣使来干预,而北宋王朝却犹豫不决,对此,余靖明确指出:“主权在我”。

余靖指出,西夏元昊的请和,很明显是从其本身的利益出发的,一旦他觉得其利益受损,其必玩弄请和的手段,“元昊累世翻覆,性同禽兽”。而对于元昊的请和,北宋王朝内部一时也无法摸清其真实意图,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余靖所

言：“自国家用兵以来，五年之间，三经大战，军覆将死，财用空虚。天下嗷嗷，困于供给。”^{[1]653}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契丹的干预。对于这种干预，余靖很明确地指出：“主权在我”，不要因为契丹来使，就使得朝廷决策为之左右。余靖分析说：“今乃因契丹入一介之使，驰其号令，遂使二国通好，君臣如初，吾数年之辱，而契丹一言解之。若契丹又遣一介有求于我，以为之谢，其将何词以拒之？若国家又有所惜，必将兴师责我，谓之背约，则北鄙生患，二境受敌矣。”^{[1]653}所以，“和”与“不和”，要分清形势，是国家主权的行使问题。

三、“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

北宋王朝与西夏、契丹的关系，在“战”与“和”的选择中，前期虽然也选择了“战”，也曾经取得了很多的胜利，但最终往往却“和”字收场，以沉重的岁币换取苟安的局面。但这样的局面，不仅不能为北宋王朝带来安宁的边境、政局；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贪心不足的夏与契丹，使得北宋王朝背上了繁重的岁币之忧，也使北宋王朝陷入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为使北宋王朝从外患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当时身为谏官的余靖，不辱使命，出色的完成了三使契丹的外交使命，更主要的是，余靖还为统治者阐明了国家利益至上的谋略。

（一）“元昊过求不宜尽许”

西夏元昊，反复小人，“外则貌从契丹，内则贪我金帛”，“无厌之求，终难应副”^{[1]652}。余靖于《论元昊过求不宜尽许》的奏议分析说，元昊的请和，乃契丹之意，而元昊的请和之目的也相当明显，就是要从北宋王朝那里获取更多的好处，而宋朝一旦满足了它的要求，它便会产生更多的要求，余靖回忆说，“景德中，契丹举国兴师深入，先帝与之对垒河上，矢及乘舆，天下安危，在于刻漏，止以三十万物与之通和。今元昊战虽屡胜，皆由将帅轻敌易动，故为边鄙之忧。数年选将练兵，始知守战之备，而锐意解仇，与物遂至二十六万，彼若不允，岂可更添？且夫戎事有机，国力有限，失之于始，虽悔何追？”并前后比较，分析说：“景德之患，系安危于顷刻，而物数如彼。今日之患，远在北鄙之外，而物数如此，臣虽愚贱，深所耻之。”所以余靖说，这种“无厌之求，终难应副”，况且，

“今虽与物更多，边亭岂敢撤备？”即使给了西夏元昊“金帛”，也不可能保证宋夏边境的安宁，而且“元昊之书，其名虽顺，其词甚悖，自言通和之事，非其本心”。“又况契丹之力，能制元昊，闻其得物之数，宁不生心？”所以，余靖指出：“元昊凡所过求，不宜尽许，一启其源，塞之实难。”^{[1]697}

因此，宋朝对夏的请求不能够一味地妥协退让，以造成更大的隐患，余靖坚决反对增加西夏的岁赐。

（二）“敌人（契丹）求索不宜轻许”

余靖上《论元昊过求不宜尽许》之奏议两个月后，余靖听说契丹耶律元衡来聘，便表现出了“臣虽愚陋，窃用忧之”的忧国情结，专门写了《论敌人求索不宜轻许》奏议，上书宋仁宗，论述了对契丹“敌人求索不宜轻许”的主张。

余靖开篇就指出，边境“无事”之时，契丹“尚可穷巧极诈，乘我之怯，以恣无厌之求，况今用兵之际，岂得默而无请？”那么，契丹此来何事呢？余靖料想，“一曰借兵于我，同力剪除；二曰见乏资粮，欲假边粟；三曰军兴费广，先借数年之资；四曰元昊与贼连谋，不宜更通和好。其它狡计，不可详知。”^{[1]715}余靖认为，就契丹的诡计而言，肯定是“敌人背约，妄起事端”，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不当但务偷安，每事轻许”，而且“我守盟誓，拒之有词”。

余靖分析道：

第一，“借兵之言，最可理夺”。早在景德年间，双方便有“休兵”之约，元昊扰我边境，我数年苦战，并未向契丹讨一兵一卒，而今，如果是夹山部落因逃亡而窜入我境，契丹与我则当竭力，同共驱除，在它未入我境的情况下，契丹假此而向我借兵，实在是无理由的，因此，“借兵之谋不可许也”。

第二，“资粮为词，亦当坚拒”。大宋王朝，虽然国家疆土广大，军马至多，物产丰富，但一国之费也多矣。“内有朝廷百官之奉，外有宾客四方之事”，而一国“赋入有常度”。怎堪“一国之财而供二国之用”呢？因此，“借粮之议不可许也”。

第三，“先借岁聘之数，尤当阻之”。契丹贪心不足，它与北宋的交好，与西夏一样，目的就是为搜刮我大宋的财物，几年来，大宋支付西夏、契丹的“岁币”越来越多，“割剥已深”，而契丹此来便要“先借岁聘之数”，这明显是“欺凌之势，无时暂已”，而“国家

之物有限,强敌之求无厌”,且“山泽之利,岁计犹有不足;桑蚕所产,民力固亦无余”。“比要两国安宁,是用不惜所有,今伐一小族,便此过求,若更有大事,如何应副?”因此,“预借岁物不可许也”。

余靖感慨地说:“臣伏读《唐史》,窃见回鹘于唐朝有收复两京之功,每岁止赐绢三万匹。今来契丹岁取我物五十万,其害深矣。伏乞朝廷密敕边臣,严设武备,倘或敌人过分求索,不宜轻许,以重取国辱。”

余靖的两篇“不可许”奏议,反映出余靖的国家

利益至上的思想境界。

总之,余靖在处理宋、辽、夏之间的三角外交关系中,独具慧眼,善观全局,利用矛盾,灵活机动,又能临危受命,挺身而出,不辱使命。余靖之所为所思,正是体现了外交官的职责在于维护平等条件下的国家利益,处强势而不谋求非分之利,处弱势尤应不丧权辱国。就此而言,余靖比福弼使辽以“增币”换取对方取消“索地”之要求强多了,余靖“不愧为古代的第一流的外交家”^{[4]60}。

参考文献:

[1]黄志辉. 武溪集校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2]脱脱. 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邵博. 邵氏闻见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2.
[4]丁宝兰. 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60.

On Yu Jing’s Diplomatic Thought

LAI Jing-y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ffairs,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Yu Jing from “harmony” political philosophy, elaborated “harmony” and “balance” diplomatic thought,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 dign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Khitan and Tangut eased tensions betwee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us defusing the crisis fac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stabi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n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 Yu Jing; diplomacy; peace; balance

(责任编辑:彭 原)